

2016/06/20
第 37 期



总结与凝练 借鉴与参考

研究生教育发展动态

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院

【“双一流”建设专刊】

◆ 观 点

- 我们的教育究竟缺什么？
- 我们该怎样办大学
- 围绕“双一流”建设创新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机制

◆ 专 访

- “双一流建设”五大着力点
- 国际视野下的“双一流”建设

引言

我国的研究生培养走向正轨了吗？我们的教育究竟缺什么？我们该怎样办大学？我们一向看重的教与学，究竟给学生提供了什么，它又缺失了什么？在外国人眼里，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正遭遇着“玻璃天花板”，在我们自己的眼里，“双一流”大学建设任重而道远。直击问题，准确定位，重新思考高教模式，全面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型，以及更加注重深度学习、努力推动创新文化，营造使优秀教师脱颖而出的制度环境，创新以学科建设为龙头的配套管理机制，等等，都是“双一流”大学建设或办好一所大学的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观点

我们的教育究竟缺什么？

1、人格养成环节最为薄弱

如何与人和谐相处和保持顺畅的沟通，如何学会自我管理与自我情绪控制，如何灵活应对工作和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具有适应性，如何对工作对他人对团队有担当，这些“情商”因素已成为影响个体生涯发展的主要障碍。毕业生进入职业生活后所反馈的非正式能力缺失，正是源自对教育中的人、教育原始底色的体系性和制度化的遗忘。学历越高、学校层次越高，毕业生所反馈的非正式能力表现越弱，也大致凸显了体制化教育中“人”与“才”颠倒的逻辑。

教育本身最为质朴也最为简单的目的——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和学会生活，日渐为指标化的（效率与公平）业绩与政绩目标所冲淡。

2、通识能力存在明显欠缺

通识能力是高校毕业生无法适应岗位需求的第二大弱项，包括两个维度：一是综合素质，在高校依托通识教育来养成，如创造力、想象力、创新意识、眼界视野和数理思维等；二是通用技能，其获得贯穿于整个教育体系，包括计算机应用能力、信息获取能力、不同语言表达能力、动手与操作能力、自我规划设计能力等。

通识能力是毕业生应对岗位调整、职业流动以及各种危机，获得职业持续发展

的基本素养与能力基础。但我国基础教育重学科知识、高等教育重专业理论的整体格局，并未发生明显松动。

3、适应国际劳动力市场能力偏弱

在外资企业就职的毕业生认为：包括非正式能力在内的各种能力欠缺都最为严重，除外语以外，其他各方面的匹配差几乎为在政府与事业单位、国企部门就业毕业生的1.5到2倍以上。这反映出：我们的教育在培养学生适应与参与国际市场的能力明显不足，整个教育体系内部人才培养过程尤其是教育环境和文化，与国际职场的素养需求存在巨大偏差。这反映出教育重知轻用、重理论而轻素养的传统积弊之深。

同时，值得关注的另一项调查是：在关于大学期间最为受益环节的判断上，所有样本选择“校外实习与社会活动”比例为37%、“同学间的互动交流”为22%、“课外自学”为15.3%，而“教师指导”和“课堂教学”仅仅为11.7%和13.6%。一向看重的教与学究竟给学生提供了什么？它缺失了什么？这或许是一个更需要高校与教师来特别关注与细究的主题。

在非正式能力、专业知识运用能力、通识能力三者之间，供需双方最不匹配，即高校培养明显不足的是非正式能力，其次是通识能力，最后是专业知识运用能力。

三者间的差别在于，各自能力培养过程的可授性依次增强。其中，非正式能力主要表现为为人处世的态度与素养，依托具体情境设置和活动与实践的参与而逐渐形成，它带有潜隐、缓慢与长期性；通识能力表现为思维能力与工具使用能力，依托开设各种正式与非正式课程来培养，课程具有基础、广博、多样和灵活的特点，多与大学乃至中小学校中带有通识与兴趣性的活动与课程间存在关联；专业知识能力则是认知性能力在特定领域的具体化，其培养主要集中于大学阶段，通过一个相对严格的专业化训练过程得以实现。由此，我们不妨审视一下，我们的教育最为匮乏的是什么？

来源：《光明日报》，2016年01月05日

我们该怎么办大学

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一、办学方式与目标的偏差

中国高等教育办学目标是培养符合社会主义价值取向、适应中国国情、能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才。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是多种模式的交错和并存：分布格局、学科专业设置、资源配置方式、行政化的教育管理体制受苏联模式影响，有强烈的专业教育意识，强调高等教育的政治性和政府对高等教育高度集中领导及刚性管理；学制，内部管理体制，教学计划、内容、组织、方法等许多方面，基本延续了以政治论为中心的延安模式；而现代大学制度，大学办学自主权，大学科研、教学、服务功能的完善，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等议题，都源于美国模式。

在办学理念的实践上，中国大学至今尚未有深入和全面的思考。“一流”的内核应是扎根于国情、扎根于国家的价值体系。但现今所谓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更多是大学的外在形态，包括办学条件、办学经费、科研成果、师资力量等等。

大学内部治理上，多年来一直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并更多地以美国模式为标本，但只是支离破碎地去学习和模仿，科研不行，看看别人的科研怎么搞，课程设置不行，看看别人的课程设置怎么搞，甚至干脆用上全英文的教材，而不将先进经验与本土国情结合。此种“国际化”，只会学得越多，出现的不协调越多。真正成熟的国家教育体系是系统性的、是与社会意识形态、经济形态协同发展的。

中国高校目前的价值判断标准具体化为评价体系。上至教育部的资源配置评价、下至学校的人事绩效评价，对大学学术水平的评价基本都是采用国外的工具，从SCI、EI到ESI，甚至直接采用国外的大学排名工具，用人评价也将“海外背景”作为选拔高层次人才的首要条件。中国的学术用大量的科研经费购买国外仪器设备，花大量的版面费把文章发表在国外期刊，把花费大量教育经费培养的青年人才送到发达国家，又花费重金和优惠待遇引进这些人才，委以建设重任。中国高等教育的评价体制透露出大学的不自信和扭曲。

二、如何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当前一些大学针对培养高等教育价值观，制定了一定的措施，例如，增加大学语文课程、降低英语比重、推广国学课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课堂、加强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等等，但举措大多零碎化，存在“局部观象”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工具理性思维，以至于不能站在更高的高度上进行战略的、全盘的、系统的思考。

现行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评估体系和标准，大多缺乏中国本土的标准和话语权，在专业化教育西化和价值观教育中国化之间存在一个难以调和的张力。应该反思，是不是国外的发表标准就一定是世界标准？英文文章就一定代表有水平？在国外版面发表的论文是否能够解决中国问题？能不能在评价标准上注入中国要素？吸收西化评价标准的合理之处与中国本土标准相结合，进而推动“不唯西方、兼具特色、服务中国、链接世界”的、自信而不盲从的评价体系，调整中国教育指挥棒，并合理地配置教育资源，培育既接中国地气、又有世界眼光的人才。

具体到大学，除了基本的育人价值体系相同以外，不能一套评价标准、一套办学理念包打天下，要根据不同的办学历史、办学条件，进行差异化选择，给予学生可以选择的余地。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发挥知识分子的主体功能，在育人理念上与育人过程中形成全员育人、专业育人和立德树人的结合，从办学理念、办学思路、办学体系到学科设立、专业开设、课程设置、教材体系、科研管理等均须做中国价值和国家标准合一的系统设计，高度契合并服务于中国价值体系与育人使命，从而做到办学理念“中国之灵”与办学体制“中国之肉”的高度统一。

来源：中国手机网，2016年05月03日

围绕“双一流”建设 创新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机制

现行的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束缚着教育发展模式优化和高校的活力。只有进一步破除制约高校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才能引领、保障“双一流”建设的顺利推进。

一、重塑高等教育发展理念

1、**重塑大学精神。**大学应成为知识发现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先进思想和优秀文化的重要源泉、培养各类高素质的、具有批判创新意识的优秀人才的重要基地。也应明确教师的改进方向，需要去除工具主义思想和浮躁作风，安心执教治学。

2、**创新学科建设管理机制。**从单一学科设置到学科内涵发展，如凝练学科方向、培养学科带头人和建设师资队伍，建立健全科学的项目负责制和目标管理模式，加强学科平台和基地的建设，优化学科环境，改善大学的内部学术管理机制，形成有影响的科研成果及增强跨学科合作水平与交叉学科融合共生水平，都需要良好的学科管理体制机制发挥作用。

二、推进高等教育治理进展

1、**理顺政校关系。**政府职能和角色要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有效政府”转变；从既掌舵又划桨的管制型向掌舵不划桨的调控型转变；从高校的控制者、管理者向提供者、服务者、合作者、监督者转变。加强高校的办学自主权：高校可按照自身发展的规律和逻辑进行自主办学；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改革和完善高校体制机制，让大学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和自主负责的法人实体。

2、**教育治理主体体系完善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教育治理主体由政府集中管制一元向由政府、高校、社会组织及公民共同参与的多元转变：强调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通过政府权力的去中心化、多元化，使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作为权力主体，通过谈判、对话、协商的伙伴关系参与高等教育的管理工作。以“互联网+”为特征的教育智慧管理，是教育管理信息化发展的高级形态和最新愿景：高等教育可通过智慧管理进行决策，智慧调度教育资源、调整教育机构布局、分配教育经费，推动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和谐的发展。

3、**“管办评”分离。**积极加强社会对高校的监督作用，调动各类社会组织参与教育治理的积极性，鼓励有关组织和专门评估机构进行教育评估，落实“管办评”绩效问责机制，通过社会影响来推动政府和高校的双方改革。三权分离模式对高校去行政化，推进教授治学、办学的发展模式有借鉴意义。政府部门应适时纳入社会组织开展的教育评估与监测，并与教育主管部门的检查、高校自查等管理活动形成互补。

三、推进高等教育分类管理

“双一流”建设强调分类管理，以差别化、个性化发展为导向，既适度发展综合性大学，也支持鼓励发展多科、单科型有学科特色的大学，这三类大学有不同的高校发展要求，要思考其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转型升级中，如何探索创建“双一流”之路。

四、建立创新创业教育管理机制

1、**建立正常化的国家、地方和高校三级管理机制。**需要政府主管部门做到机构职责明确和工作到位；要健全国家和地方、政府和社会多部门联动高效的工作机制，动员教育、科技、财政、企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多方面力量，破解制约创新

创业的政策、技术、资本、内容及激励等多方面困境；高校要自觉落实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主体责任，以全方位、多层次的指导服务为支撑，做到“机构、人员、场地、经费”四到位，对创新创业活动实行持续帮扶、全程指导和“一站式”服务，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

2、建立优惠政策保障机制。有关各方要推动完善、落实、扶持创新创业优惠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如：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尽快制定简化创业手续、降低创业门槛的具体办法，加快构建“一站式”服务平台和“绿色通道”，落实好自主创业税费减免、小额担保贷款、创业地落户、毕业学年享受创业培训补贴等优惠政策。深入实施新一轮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重点支持大学生在新兴产业创业，加大互联网创业扶持政策的制定。多方整合社会和政府财政部门的资金，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加大高校科技园、创业园和创业孵化基地建设。

五、创新以学科建设为龙头的配套管理机制

1、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优化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修订人才培养方案，使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既融于专业教育之中，又能训练于独立的体系中。建立创新创业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深入实施和支持各类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和竞赛项目，完善国家、地方、高校三级创新创业实训教学体系。改革学籍管理制度，建立保障创新创业的弹性学制等。

2、创新师资队伍建设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有效保障师资队伍积极性和创造性。建立健全依据一流学术标准的教师工作绩效奖励制度，破除职称工资和绩效工资混淆不清的弊端。

3、创新科研管理及成果转化机制。按照学科布局，重点建设、引导性建设规划科研项目申报、建设及培育。对若干学科的研究前沿领域，创新平台的搭建、资助和奖励等机制，培育创新团队和营建学术大师产生氛围等进行重点资助和经费保障。将有重大影响的科研成果，转化成生产力和经济效益，形成产业链，服务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收益进一步反哺学科建设。

4、引入竞争机制与资源配置机制。创新财政支持方式，推行绩效优先，引入竞争机制，进行动态管理，形成激励约束机制，打破平均主义。资源投入向办学水平高、特色鲜明的学校倾斜，在公平竞争中体现扶优、扶强、扶特。对获得经费、项

目支持的高校实行专项资金合理使用监管和项目法人责任制，确保项目实施的有效性。增强高校财务自主权和统筹安排经费的能力。加快建立资源募集机制，拓展资金渠道，实现高校和社会双赢局面。

来源：《北京教育》，2016年3月

专访

“双一流建设”五大着力点

“双一流”不能完全按照评估指标来建设

《世界教育信息》：在您看来，什么样的大学和学科称得上是世界一流？

王建华：以指标量化评估，世界一流学科和大学是动态的，每一年排名都会有变动，且以不同的指标为参照，学科和大学的排名可能差异巨大；用历史的视野审视对人类的贡献来理解，世界一流学科和大学相对稳定。前者是现在大学的普遍选择。我国的“双一流建设”无法避免世界大学排行榜和各类学科排名的影响。但要正确认识评估指标和排名的利弊，不能完全围绕评估指标进行学科和大学建设。

着力点 1：建设好遴选出的学科是当务之急

《世界教育信息》：我国大学在重点学科建设上有什么特征？这些特征有何利弊？

王建华：受到经济领域重点建设的启发，以国家重点学科的评选和评估为抓手，政府掌握了学科建设的主动权，随后省级、市级以及校级重点学科评选纷纷出台。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发文“取消国家重点学科审批”，说明国家重点学科建设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当前大学学科发展的要求。

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是国家重点学科建设的“升级版”，既要借鉴后者的经验，也要防止一些思维定势和习惯做法造成的消极影响；应打破大学内部国家重点学科因身份制而形成的固有利益格局，重新洗牌，将学科竞争的舞台直接放在世界范围内；要集中精力建设好那些公正遴选出的学科，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一流，而不要以此为抓手，继而衍生出一系列其他的一流学科，比如省内一流、国内一流等等。

着力点 2：“双一流”应营造使优秀教师脱颖而出的制度环境

《世界教育信息》：“双一流建设工程”中强调，深入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加快

培养和引进活跃在国际学术前沿、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一流科学家、学科领军人物和创新团队。您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体会？

王建华：学术精英的聚集成就一流的学科，一流学科的汇聚成就一流的大学。反之，一流大学吸引一流学者，一流学者创造一流学科。

“双一流建设工程”需要的是人才辈出，而不是人才计划辈出。高校要避免将人才计划的入选者直接等同于人才。人才的标签化和商品化不利于大学和学科的长远发展，会加剧科研功利主义和学术资本主义。

高等教育要有竞争力的薪酬，更要有使人脱颖而出的制度环境。要在人才发展机制体制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人才管理体制更加科学高效，人才评价、流动、激励机制更加完善，全社会识才爱才敬才用才氛围更加深厚，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政策法律体系和社会环境。

着力点 3：“双一流”建设应着力于应用和成果转化

《世界教育信息》：“双一流建设工程”中强调，深化产教融合，将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着力提高高校对产业转型升级的贡献率，努力成为催化产业技术变革、加速创新驱动的策源地。您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认识？

王建华：“双一流建设工程”之所以特别强调“着力推进成果转化”目的在于使大学之于社会的应用性从自发走向自觉，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我国对创业型大学的重视程度相对不足，是因为研究型与应用性相互矛盾，且我们对于研究本身的重视超越了对于研究成果应用性的重视。未来的知识社会中，为应用而研究才是正途。高等教育应实现从研究型向创业型的转型，或从创业型大学向其他范式的大学转型。

着力点 4：国际教育交流合作有助于“双一流”建设

《世界教育信息》：“双一流建设工程”中强调，加强与世界一流大学和学术机构的实质性合作，将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有效融合到教学科研全过程，开展高水平人才联合培养和科学联合攻关。您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

王建华：作为后发外生型国家，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开展高水平人才联合培养、加强国际协同创新等都是必不可少的举

措。但绝不能完全依靠“国际化”，必须首先“自力更生”。中国大学要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世界一流，必须积极“参与国际教育规则制定、国际教育评估和认证，切实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树立中国大学的良好品牌和形象。

着力点 5：“双一流”建设必须教学与科研并重

《世界教育信息》：一流本科是一流大学的重要基础和基本特征，各高校要大力发展建设一流本科教育，将建设一流本科教育纳入“双一流”建设方案，不断提升教学水平和创新能力。您认为在“双一流”建设中应该如何发展一流的本科教育？

王建华：由于科研绩效是硬指标，教学质量是软指标，在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中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时有发生。但只是同时发生，二者没有必然关系。

通过学科排名和大学排行，短期内我国就能拥有世界一流学科或一流大学，但如果没有一流的本科教育我们绝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高等教育强国。将建设一流本科教育纳入“双一流建设”方案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只有切实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学生的创新能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才能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采访专家：王建华，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世界教育信息》，2016年第10期

国际视野下的“双一流”建设

《环球教育时讯》：您是国内大学规划方面的专家，请就“双一流”的实施策略和具体途径稍做解读。

别敦荣：“双一流”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时期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目标指向非常明确，分三个阶段推进，即到2020年要有一批大学和学科成为世界一流，到2030年要有一批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的前列，到2050年要有一大批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的前列，中国成为高等教育强国。要以师资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技术转化为重点，鼓励和支持不同类型的高水平大学和学科差异化发展，实行绩效评价机制；要加强和改进党对高校的领导、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实现关键环节突破、构建社会参与机制、推进国际交流合作等要求。这有助于将“双一流”建设与综合改革结合起来，创造更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环球教育时讯》：我们知道，有些高等教育强国在“双一流”建设方面积累了很多好的做法和经验。请为我们分别介绍一下。

别敦荣：美国发布《领导力考验：美国高等教育未来规划》、《美国竞争力计划》，意在强化美国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的竞争力，并为之出台了一揽子配套法案，如《学术竞争力资助法案》、《确保天才进入国家数学和科学领域的资助法案》、《美国竞争法案》等，构成了美国强化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战略基础。联邦政府在10年里投入500亿美元用于研究基金，投入860亿美元用于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等学术项目。联邦政府特别重视各种咨询组织的建设，以充分发挥它们的战略研究作用，如学术竞争力委员会、国家数学顾问小组等。

德国政府启动“卓越计划”，实施国家战略行动。重点资助方向包括三个方面：研究生院项目，旨在培养优秀博士生；卓越集群项目，重在推进尖端科学研究；未来设想项目，大力支持大学的前瞻性领域开拓。德国联邦和各州政府前后共投入近47亿欧元，40所大学从中受益。且该计划实行严格的退出机制，接受资助的项目要接受三次评估：事前评估、事中评估和事后评估，执行不良的项目必须退出。

日本提出“21世纪卓越中心计划”，也称“远山计划”，瞄准国家和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二流大学的学科和学术领域，包括人文社会学科和科学工程，其中，交叉学科和新兴学术领域获得资助的项目最多，又启动了“超级全球化大学计划”。文部科学省在104所国立、公立大学中选取37所进入此计划。此计划分两个层次：进入世界大学排名前100的“冲锋型”学校，每年资助4.2亿日元，共13所，具有大学教育国际化代表性的“全球化牵引型”学校，每年资助1.7亿日元，共24所。均连续资助10年。

《环球教育时讯》：英国拥有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深厚的学术传统对英国大学的学科建设具有重要影响。您如何看待英国高校在“双一流”建设方面的经验？

别敦荣：英国大学本身在“双一流”建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英国政府发布了《高等教育未来白皮书》，提出了加强卓越研究、卓越教学、加强高等教育与工商业的联系、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增加投入和自由度等举措，以引导大学迎接挑战。以2001年“大学科研评估”（The 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的评估结果作为拨款主要依据，主要资助达到5级及以上等级的大学。2004-2006年的拨款总额达到近87亿英镑，排名前25位的大学获得了75%的拨款。

“大学科研评估”是由第三方专业机构负责实施，三分之一的评估专家是国外的著名专家学者，评估标准包括科研队伍的情况、代表性科研成果、科研环境、科研

经费投入等。2008年，评估结果改为五个等级，按照研究的创造性、重要性和精确性等达到的水平分为4级世界领先水平、3级国际较高水平、2级世界水平、1级国内水平以及没有级别。此后，英国用“研究卓越框架”（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取代了“大学科研评估”，采用文献计量指标，标准更为多元化，尤其是审视大学研究对经济、社会、文化、公共政策、环境产生的影响，为美国、澳大利亚和欧洲多国发展和改革评估提供了范例。

《环球教育时讯》：您从事国内大学规划工作多年，还有哪些国家的经验可以和我们分享吗？

别敦荣：法国发起了“投资未来”计划，致力于建设5-7所世界一流大学。俄罗斯实施了“5-100计划”，目标是2020年有5所大学进入世界前100名。国际趋势展现了各国相互交流和借鉴、共同创造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新纪元的需要。

《环球教育时讯》：以上国家的经验，有什么地方可以为我们所借鉴吗？如何做到洋为中用，避免生搬硬套？

别敦荣：以上国家建设“双一流”的经验对我们的启示主要有：一是发挥政府和大学两个积极性，重视发挥政府的导向作用和巨额财政支持作用，重视大学的主动作为，赋予大学更大的办学自主权；二是重视社会参与，尤其是重视第三方评估的作用，建立和完善第三方评估体系；三是建立和完善竞争与退出机制，摒弃“重投入、轻绩效”的做法，使“双一流”建设充满活力。

采访专家：别敦荣，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来源：《上海教育》，2016年3月

呈：校领导

发：各院院长、主管院长、教学秘书、研究生导师等

本期编校：梁大鹏、李传江、英爽、张丽娟